

D751.20/2
7753



斯大林现象史

〔法〕让·艾伦斯坦著
方光明 郑德弟等译

时事出版社

斯大林现象史

[法]让·艾伦斯坦著

方光明 郑德弟 译
张忠其 陈 惕

(内部发行)

时 事 出 版 社

1986 年

Jean Elleinstein
Histoire du phénomène
STALINNIEN

Bernard GRASSET

Paris, 1975

根据法国格拉塞出版社1975年版译出

斯大林现象史

[法]让·艾伦斯坦著

方光明、郑德弟等译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杭州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8 字数: 16万7千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册

统一书号: 3225·042 定价: 1.25元

(内部发行)

译 者 说 明

本书由方光明主持翻译，其中前言、第一、第二章由郑德弟译出，第三、第四章由张忠其译出，第五、第六章由陈惕译出，第七、第八、第九章由方光明译出，然后由方光明统译、校定，并作注释，凡作者原注，均译出后在注末指明。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中国社科院马列所苏绍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的不少帮助，在此谨致谢意。由于译校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序 言

苏 绍 智

斯大林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日益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世界各国用各种观点研究斯大林及其有关问题的专门著作，可以说是成百上千，汗牛充栋。让·艾伦斯坦所著《斯大林现象史》一书（1975年，巴黎出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丰富的史料，在互相矛盾的事实中探讨了“斯大林现象”，分析其起因，研究其深刻性，阐述其前景。这本书在法国共产党左派中广为流传，并日益得到国际上左派人士的重视。今天，中译本的出版，对我国学术界研究斯大林的理论 and 实践，关系至为重要，也一定会在我国产生积极影响。

让·艾伦斯坦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反马歇派的主要成员，现年56岁，著有《革命的革命》（1967年），《巴黎公社研究》（1971年），《人民阵线史》（1934—1939年的法国）（1972年与他人合作），《从战争到解放》（1939—1945的法国）（1972年），《苏联史》（四卷本）（1972—1975年）。《斯大林现象史》是其《苏联史》一书的补充。

艾伦斯坦在本书前言中说明了他为什么不用“斯大林主义”、“个人崇拜”和“斯大林时代”等词，而提出“斯大林现象”这个词来。他说，他这样提的目的在于强调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这个现象本身决不能以斯大林个人

的品性来解释。他在本书中指出：“斯大林现象并非与其人同时产生，也不因斯大林的逝世而消失。它并不局限于苏联，但苏联是这一问题的震中。它涉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涉及到所有共产党。”“这本书的宗旨就是描述并解释这一现象。”因此，这本书所研究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就不限于苏联了。

作者没有给“斯大林现象”下定义，他只打算描绘出一个历史的概况。他认为斯大林现象包含以下一些重要的有害的部分：领袖崇拜；官僚主义；大规模镇压以及最终形成的极权主义政体。

作者认为“斯大林现象”虽然起源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环境中发展蔓延。但是，决不能说“斯大林现象”是社会主义的产物，更不能说“斯大林现象”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或不可避免性。“斯大林现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即十月革命和俄国的历史条件建立了一个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的一些结构、传统、环境和人使“斯大林现象”得以产生，也赋予“斯大林现象”以众所周知的面貌。

具体地说，在俄国革命和内战中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孕育着“斯大林现象”的萌芽。列宁在1921—1922年间的著作，实际上已经阐明“斯大林现象”的根源及其产生和发展，并力图抑制它。在俄国革命初期，为了在军事上对付反革命，同时在经济上和行政上粉碎他们的破坏，年轻的苏维埃有实行革命专政，进行镇压以至实行红色恐怖的必要性。但是，在1921年，战争已经结束，相当数量的机关、组织和机构已经建立起来，形势已经不再需要那种“依仗武力的、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无限权力”的专政的时候，这种专政却继续存在甚至加强了，例如政治警察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至

监视一切，享有包括逮捕、审判以至判决可疑分子的独断权力。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叛乱更加强了镇压。专政是必要的，又是危险的。只要专政不朝着民主方向演变，它就会对劳动者构成一种威胁。这样的专政意味着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有可能行使无限的权力，并且不适当地去行使它。这正是“斯大林现象”的萌芽。列宁在1921—1922年的著作中，对于泛滥的官僚主义现象深感不安，而提出建立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实行工农监督和“使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民主化”的问题；还提出发展生产和实行真正的文化革命、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合作社、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列宁更具体地对斯大林掌握无限的权力而深感不安。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经济上更大的自由化，以及警惕这种自由化所包含的危险，布尔什维克更加强了专政，致使列宁的设想未能实现。随后，为了进行经济建设，在苏联那样落后的国家，需要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斯大林通过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的措施，直到对农民和对党本身实行恐怖的办法，以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从而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这就导致了以恐怖和专政为特点的“斯大林现象”的完成。

作者还认为“斯大林现象”的产生还与俄国的国情有关。专制、独裁和君主专制是沙皇俄国的特征。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人们可以通过法律来突然取消它，但却无法从人们的思想中立即根除它；人们可以用武力来摧毁它，却无法在朝夕之间便从人们的灵魂和日常政治生活中把它扫除干净。布尔什维克采用了传统的手统，例如采用“个人崇拜”来为其服务；这也是起因于俄国的历史不存在民主机构，也是俄国的国情。沙俄时代固然没有实行过民主政治，就是后来的革命和内战时期也未给实行民主提供良好的条件。过多

的集中使民主削弱，而没有民主的集中制则逐渐转化成一种专制。由于缺乏民主，高度集中，没有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官僚主义和专制独裁在这块土地上蔓延发展，这时便没有任何力量能与之抗衡了。于是，无所不管的国家同无所不管的党合在一起，而无所不管的党又同无所不管的斯大林合在一起，这就出现了“斯大林现象”。

“斯大林现象”的存在，对苏联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作者认为尽管斯大林搞了极权主义，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一直到1937年仍是发展的。这取决于苏联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即生产资料以及生产和流通的社会主义化，取决于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管理方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斯大林现象”却阻碍了经济发展，起了反面的作用，以致在1938年由于肃反扩大化，丧失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干部，出现了生产无组织状态，导致1939年钢铁生产停滞，和1941年纳粹进攻苏联时苏联处于无戒备状态。直到战后，“斯大林现象”使得苏联在人口方面和经济领域中某些方面落后了。作者提供材料说，从1913—1953年，苏联人口由于战争、饥荒、恐怖，损失了4,500万人，出生率的亏损也同这个数字相当。苏联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使得重工业和社会文化措施得以发展，但“斯大林现象”却使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水平、人民消费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方面遭受到巨大的牺牲，以致到了1953年，“斯大林现象”成为苏联进步的障碍，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

作者得出的论点是：必须把“斯大林现象”和社会主义分开。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苏维埃制度保证了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使历来落后的各民族，摆脱了贫困、迷信和愚昧，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真正飞跃。作为一种极权政体，却

又为合理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设下了障碍。“斯大林现象”有两重性：社会主义要坚持，“斯大林现象”要消灭。而在社会主义生产大发展、民主大发扬和文化教育水平大提高的条件下，“斯大林现象”也是可以消灭的。

作者还分析了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实际，他认为，从1953—1956年，赫鲁晓夫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这些变革带有根本性，是行之有效的，对于消除“斯大林现象”最束缚人的东西方面也是有贡献的。苏共二十大及其随后作出的决定指出了“斯大林现象”最有害的部分，但对“斯大林现象”的整体没有深入讨论，没有触及事物的本质，也没有指出“斯大林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赫鲁晓夫的报告把“斯大林现象”缩小为个人迷信，闭口不谈制度上的问题，只归罪于斯大林个人的品质。苏联不能对产生“斯大林现象”的根源上从制度予以改变，因而不能消灭“斯大林现象”。而赫鲁晓夫提出的一些对内对外的新政策却遇到了领导层内部的强烈反对。特别是许多领导人害怕议论“斯大林现象”，一是由于“斯大林现象”的许多重要方面涉及到前段时期的积极成果，会妨害到苏联赖以生存的平衡；二是根据他们自身的习惯和自身的实践，他们自己也同“斯大林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甚至赫鲁晓夫的不彻底的改革也不能为领导层内的保守派所容忍，赫鲁晓夫的统治连同他的改革终于结束；一连串的问题仍然存在，“斯大林现象”继续产生不良的影响。

艾伦斯坦的分析虽不是没有可讨论之处，但他确实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在一个生产力落后而又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怎样才能避免出现“斯大林现象”；一旦出现以后，如何把产生“斯大林现象”的根源从制度上予以改变。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从具体制度上消

灭产生的根源，“斯大林现象”将会由于领导阶层中的保守力量和领导中习惯势力的维护而继续下去，甚至在一度被否定以后，还会死灰复燃。

目 录

序 言	苏 绍 智
前 言	(1)
第一章 渊源	(3)
第二章 产生	(29)
第三章 困难	(66)
第四章 凯旋	(93)
第五章 考验	(119)
第六章 鼎盛和衰落	(142)
第七章 在社会经济方面	(171)
第八章 社会主义国家和民主	(193)
第九章 通向灭迹之路	(211)
对斯大林的理论 and 实践进行再评价	方 光 明

前 言

“斯大林现象”并非与斯大林其人同时产生，也不因斯大林去世而消失。它并不局限于苏联，但苏联是这个问题的震中。它涉及到二次大战后诞生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涉及到所有共产党。它既触及到理论方面，又触及到实践方面；既和政治有关，又和经济、思想意识有关。在苏联，它是列宁死后的二十年代才产生的，而在斯大林去世（1953年）和苏共二十大（1956年）以后，它便开始衰落。“斯大林现象”这一表达方式是值得推敲的，但重要的是要了解其含义。我并不觉得“斯大林主义”这个词可憎，但它使我感到某种不快。因为从历史上看，这是资产阶级的发明，也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方面所使用的一种武器，尽管它是一个常用（包括共产党人）、方便的和通俗的词汇①。

我觉得，苏共所采用的、随后又在国际共运中得到广泛使用的“个人崇拜”的提法并不好，因为它只强调了现象的一个侧面：对领袖的崇拜。至于“斯大林时代”的提法，它过分局限于现象持续的期限，因此也不妥当。此外，连“斯大林的”这个形容词也有问题②。因为人们不能把这种现象仅仅归结于斯大林的品性，更不能以此来解释现象的本身。当然，由于明显的历史原因，这一现象是与斯大林紧密相连的。“斯大林现象”这个提法，从时间和空间上说都有较大的伸缩性，因此，它比其它任何提法都更使我满意。

描述并解释这一现象，是我写这本书的宗旨；这一工作是对我四卷本《苏联史》的一个补充；《苏联史》最后一卷最近刚刚出版，它是由社会书局发行的。

在互相矛盾的事实中研究“斯大林现象”，这是我的第一个目的，它比只从表面上看问题要困难些。了解这一现象的起因，并由此了解其深刻性，这是第二个目的。任何关心我们的变化并加以思索的人，对此都会感到兴趣。今天，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这一悲剧性的窘境：要末用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来解释“斯大林现象”，把它看作共产主义的意外事件；要末把它看成共产主义的不可避免的自然产物。下面，我们试图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① 参见莫里斯·多列士学院的《历史备忘录》中提到的各种不同的看法（关于我的《苏联史》第2卷的讨论）第101—108页（参加讨论者有：克罗德·维拉尔，让·瓦贡，让·勃鲁阿，理查特·拉格什，亚历山大·阿特雷），还可参见阿尔杜萨的《答约翰·莱文》第60—67页，以及《关于“斯大林主义”一词》的第82—83页。

② 这个词最初见于托洛茨基著作中，继而在反共出版物中一再出现；然后，在1929年后的共产主义出版物中也加以运用。可以说，在20年代末方采用“斯大林主义的”这个形容词。

第一章 渊 源

内战结束时，苏俄的经济状况极为糟糕。1913年，沙俄远非是富国。1880年以来的工业发展虽然是事实，但毕竟有限。当时，能源（石油、煤）的开发超过了本来所称为“工业”的生产。虽然俄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工业强国，然而，以人口计算，它却远远落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后面。

人口只有俄国四分之一的法国，其工业生产却是俄国的二倍半。美国工业生产的绝对数字是俄国的十四倍，而以人口平均计算，则是它的二十二倍。而且，这些数字只反映了数量上的情况，从质量上看，差别还要大。此外，俄国的工业化并未深刻改变这个辽阔的国家的农村结构。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和某些地区（圣彼得堡、莫斯科、顿巴斯、巴库、乌拉尔）的工业，在沙俄的巨大的乡村躯体上，好象是几块镶嵌。

农业经济由于工具落后，很少使用化肥，而且缺乏科学管理，因此仍然贫困而落后。单位面积产量很低，与可耕地面积相比，农村居民也显得多了。

况且，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

除军火生产外，工业几乎不复存在，而农业生产也下降了一半。请让数字来说话吧：

工业（1913年为100%）	1920年	1921年
煤	26.8	30.8
石油	41.1	42.7

铁	1	1.6
冶金	8.7	9.3
糖	5.9	6.7
棉纱	5.2	7.5

农业	1909—1913年平均数	1920年	1921年
粮食（普特）	4079	1738	1617
耕地面积（垧）	81.2	56.8	49

1 普特 = 16.380 公斤； 1 垧 = 1.925 公顷

农业生产的衰退造成了1920—1921年冬天的饥荒，这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饥荒之一。从伏尔加河到乌拉尔山边，从高加索、萨马拉、乌发、喀山、察里津、斯托夫罗波尔直至克里米亚，在这块大约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区里，有二千四百万人受到了这场饥荒的袭击。人们的确重新投入到了最落后的时代之中，大批人纯粹因饥饿而死亡。在饥饿蔓延之际，斑疹、伤寒、霍乱等瘟疫也十分流行。（在1917—1921年，斑疹、伤寒的受害者，竟达二千多万。）饥荒夺去了七百余万人的生命。此外，还要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一百五十万人，内战中死亡的一百万人和死于瘟疫的三百万人。从1914年到1921年，由于内外战争及其后果，总共造成了一千三百五十万人的死亡。移居国外的人数达二百万。数以千万计的乞丐、流浪汉、弃儿遍布农村各地。盗匪活动十分猖獗，宛如法国督政府时期一般。如今，人们过份轻易地忘记了1921年的事实，或者低估了它的严重性和后果。

苏联经济发展并不始于1913年那种形势。它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于1921年，确切地说，开始于那时的实际形势。

硬要布尔什维克承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这是困难的。至于内战，布尔什维克曾试图避免。诚然，他们并未拒

绝内战，但这并不是他们造成的。从1917年11月中起，白卫分子组织了一支军队，打算重新占据彼得格勒，但在布尔科沃被击败。尽管德苏签订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但直至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时，德国人还在直接干涉乌克兰。1918年3月，曾经穿着奥地利军服参加对俄作战的三万名被释放的捷克俘虏发动叛乱，反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打倒苏维埃，白卫分子建立了好几支军队；而十七个国家（法国、英国、日本、土耳其等）的军队也参与了反对革命。

“战时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从小生产和内战中产生出来的一幅共产主义漫画。高征购是这项政策最耸人听闻的基本内容之一。这项政策受了乌托邦思想的影响。根据乌托邦的设想，直接地、迅速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是可能的^①。1918年，曾宣布过废除商品生产。可是，大家知道：正象党纲所规定的那样，在当初那样的条件下，最紧迫的根本性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1921年10月17日在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新经济政策^②产生于这种客观必要性，但是内战遗留下来的两方面的问题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革命前本来就不多的技术干部大部分离开了俄国，以及外国的几乎全面的封锁。这就意味着必须在没有技术干部和外国资金的情况下进行俄国的复兴。

这种情况对于二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不是没有影响的。它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历史沃土的一个组成部分。1921年苏俄的形势要求首先发展生产。

夏尔·贝特兰在其新作——《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一卷1917——1923）一书中，干脆不去研究内战以后苏俄的经

济条件，于是，空谈历史以用来代替历史研究。“使俄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一任务落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肩上；列宁大致指出过的这些任务是多方面的。而这些任务首先就在于改变思想政治关系”。（贝特兰：《苏联的阶级斗争》第456页）很自然，必须加以批判的正是对于“首先”这种提法。诚然，改变思想关系和政治关系是必要的，我并打算否认这一点；但是“思想”、“政治”这些限定词的位置，虽然并不意外，但只能引起争论。因为在1922年，根据列宁的意见，所“首先”必须保证的是发展生产力。在批判布哈林所鼓吹的“生产民主”这一口号时，列宁指出：“生产永远是需要的。而民主不是永远都需要的，无所谓民主的问题……”。而且他早就明确表示过：“民主只是政治方面的一个范畴”（1920年12月30日列宁的演说，分别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10页和第9页。）。

这种说法我并不赞成，因为我觉得它过于使人受到限制，但是上面这段文字着重表明了生产在列宁眼里的重要性。

经济上“可怕的灾难”给苏维埃实验的前途带来了悲剧性的社会后果。我们已经从人口统计的角度研究过这种后果，我们对于1921年——1922年冬天的饥荒所作的描述也可以使人们对内战以后人民的贫困有所了解；但是，内战还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阶级状况。最严重的是，无产阶级消失了。在1921年10月17日的讲话中，列宁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我们无产阶级由于战争和极端严重的破坏，已经失去阶级性，这也就是说，它已经逸出自己的阶级轨道不再作为无产阶级而存在了……。既然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已被破坏，工厂已经停顿，无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它有时在形式上仍算作无产阶级，但它已经同经济基础没有联系了。”③